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8-75

2008年10月17日

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上）

——我讀李零

中國稅務雜誌社社長 張木生

第一章 導讀

一、文化立場和立場文化

我與李零先生是“髮小”。小學、中學在一個學校，文革初同遊祖國大好河山。他幹過的許多事，我比他玩得早（如刻印、讀哲學書），但多是虎頭蛇尾，而他卻後發先至。李零最喜歡的稱謂是“讀書人”，早年他讀的書，我也讀，甚至比他讀得早，但枉擔著一個“讀書人”之名。李零從小幹什麼都講基本功，書法、國畫、篆刻、寫舊體詩如此，讀書也如此。我至今保留他初中讀《詩經》

的筆記，下功夫深了去，而我讀書，圖新鮮，淺嚐輒止。

如果我告訴讀者，1966年文革初期，李零的父親正在挨鬥，而李零躲在我家，將《馬恩全集》、灰皮、黃皮書通讀並做讀書筆記，造反派來突擊檢查，李零的第一反應是丟下其他，抱上讀書筆記，攀梯、蹬樓頂，隱匿筆記，現在的孩子會莫名驚詫。但這是真實的故事。後來，他投靠我，一塊兒在內蒙臨河插過隊。再後來，因為一條板凳上坐不下兩位先生，知識分子最擅窩裡鬥，1982年，“躲得起”的李零又被我調到我所在的社科院農經所。

我和李零都屬鼠，按干支計，恰是一個甲子。國人應變能力極強，論到哪個生肖，都有讚頌之詞，說幾句好話恭維。但老鼠的好詞似乎真不多，獐頭鼠腦、無名鼠輩、膽小如鼠，是貶意。一想到老鼠就只有穿牆毀器竊食偷油。就說鼠排生肖之首，“老”有長壽之意，祝頌鼠壽綿長，大發鼠財，也讓人彆扭。屬相和人性無關，若要比喻，就是李零獨來獨往的精神。魯迅《中秋二願》，“一願：從此不再胡亂和別人去攀親。”“二願：從此眼光離開臍下三寸。”再有名的洋人，再有勢的權貴，李零從不勢利，更無奴顏，倒多有些尖刻，有些激憤，長短隨人說，是非無媚骨。

李零的書好看也好玩，學貫中西，旁徵博引，細密考證，但又絕沒有過於的書卷氣，賣弄洋屁，抖學問，掉書袋的酸文假醋。看他的書直白、痛快、幽默、恣肆汪洋而不拘一格，咀嚼著文字就能品味出人生，品著人生就能參透古今。他是用業餘的態度研究專業，用專業的態度研究業餘。

從專業角度講，他是一位用現代眼光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同時精通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獻三個領域的學者，他的著作很多，有十幾部代表作，《中國方術正考》、《中國方術續考》、《孫子十三篇綜合研究》、《孫子古本研究》、《吳孫子發微》、《兵以詐立》、《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入山與出塞》、《鑠古鑄今》、《放虎歸山》、《花間一壺酒》、《李零自選集》、《喪

家狗——我讀〈論語〉》、《人往低處走——〈老子〉天下第一》、《去聖乃得真孔子》只是其著述的代表。他還翻譯出版過荷蘭漢學家高羅佩的《中國古代房內考》，寫過其他許多專著和大量的論文。這些著作，很專業，但同時很好讀，只要用心就能讀懂讀樂。他不僅讀書多，而且行路廣，他曾頻繁出訪歐、美、日、港、臺，講學和研究，近年則把注意力轉向中國大陸本身，有計劃地在國內安排各種訪古旅行，調查野外古跡和博物館，足跡遍於大江南北。國外，他說，他最想去的幾個地方是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中亞、蒙古和俄國（那是舊大陸文明的傳播路線）。

雜文，是李零的業餘愛好。如果說，李零在專業領域裡是把現代問題拉到古代去談，那麼他的雜文就是把很多古代問題拉到現代來討論。人類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自其不變而觀之”，總有一些亙古不變的興奮點，相通處。

雖然身在學術圈，但李零的知識分子意識非常淡薄，可以說幾乎沒有。他拒絕把自己歸類，也很難把他歸類，用他在《花間一壺酒》中的話來說就是：“我一直在逃，從專業學術的腹地逃向邊緣，從邊緣逃向它外面的世界。”¹

他是屬於逃跑類，他一貫保持的是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

李零的這種逃跑意識可以在他的知青生涯中找到答案。七年的知青生涯，他看到農民生存的艱辛，也看到農民的智慧。那種在艱難的環境下表現出來的生存智慧，至今讓李零欽佩不已。在他看來，農民和學者，都不過是一種活法，沒有什麼高下，別以為自己讀了點書就是個什麼了不起的東西。這話讓學者聽起來有點刺耳，不過，我倒覺得，恰恰是這種逃跑意識，讓李零保持了自己的思想獨立性，絕不人云亦云，即使眾口一詞，李零也有李零自己的說法。

人類這五百年，進步最快的是科學技術，人類近二百年來，

¹ 李零：〈自序〉，《花間一壺酒》，同心出版社2005年。

進步最慢的是文化歷史觀。這不是價值判斷，而是一個基本事實，即使在近代西學全面佔領中國之後也是這樣。我認為中國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現代學術有了李零，其犖犖大端者幾十部著作，淪肌浹髓，不僅深刻，而且平發了許多生氣。

李零的書提倡一種志存高遠的學~研~學的治學態度。李零考慮歷史的一些基本前提與多數學者不一樣：一個是懷疑一切的歷史研究，一個是開方支招。因為一旦有了實用立場，就有了框框和局限，實際上是接受了很多流行文化立場和流行的歷史見解，即便是改造了配方，基本上是利用原來的配方和佐料，仍在三界內，未出五行中。

要對成說敢於懷疑，首先要敢於解讀馬克思的歷史觀、西方的文化價值觀之不足。他們的共同錯誤是西方中心論，傲視其他文明。這在 19 世紀是必然，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的局限。所以，先瞭解，後懷疑——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用現代的水準看都有問題（嚴格講，馬克思主義的來源不包括空想社會主義）；先瞭解，後超越——實踐檢驗，馬列所說的社會主義在任何地方都未完整的實現過。

李零對上述文化的批判不是採取系統論述的方法，但他的所有著作、歷史研究都涉及這些讓他長期苦惱的問題，即基本文化立場和歷史觀問題。黑格爾就是西方中心論的代表人物，他將東方文明看作早熟的嬰兒，酒精瓶裡長不大的嬰兒。

李零不搞影射歷史學，但他善於打通古今，打通人和動物的關係，古與今、中與外，不管時間、空間之間的錯位有多大，很多都是一些很現實的問題，毛毛蟲變花蝴蝶，骨子裡是一樣的。但是，李零對這些大問題的論述都是蜻蜓點水，點到為止，不搞“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李零說得好：生活是活人的歷史，歷史是死人的歷史。我是專業研究歷史，業餘研究現在。生活是小道理，歷史是大道理。小道理通大道理。History 的本義是求知，我是把歷史當活人的歷史來研究，並把生活中的事當學問來琢磨。這是今天的話題。

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錢是萬萬不能的。學術研究，不能沒錢。自古及今，煮字療飢，少有嘗聞。恩格斯不資助馬克思，《資本論》很難問世，但光憑錢也堆不出真學問。正史是官修，官家多忌諱，為尊者諱便要多塗飾，塗飾愈厚真相愈少。現在的史學熱，說法是盛世修史，一部大清史撥款上億，撒銀子，設衙門，千軍萬馬修長城，學術也成了首長工程。

史家之史識史才史德，同盛世衰世本無關係。若說《春秋》是第一編年史，又說是孔夫子親躬刪訂，其間“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有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當然不是盛世。“盛世修史”，多懷鬼胎，頌聖以自獻，借聖以自高，倚聖而弄財，讚聖以封官。

但官家修出來的堆積如山的史書，沒有一部比得過司馬遷刑餘之人發憤所著的《史記》。太史公自述：“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者。”司馬遷的感覺，這不是盛世。《漢書》、《後漢書》、《三國誌》、《資治通鑒》也是成於一人的獨斷之書。李零從不參加千軍萬馬修長城的熱鬧，他研究歷史，從來是退居清靜，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之書。

“教授的意思是專家，一般都有職業病。現在的教授，要有博士出身。但博士不博，和古代的意思完全相反。”李零的文章，喜歡講大道理，但不是黑白分明，小葱拌豆腐的道理，因此難免讓人覺得有點繞，有點模糊，有點囉嗦，篇幅長了點。不是非此即彼，二律背反，是李零文章的特點，也是他的優點。

李零說：“我講的歷史是生活中的歷史，但不一定是眼下時髦的通俗歷史。通古今，垂教訓，明道德，辨忠奸，中國民眾有講史傳統，這是通俗歷史的基礎，大眾閱讀趣味的穴脈。我自己的書，我自己明白，娛樂性不夠，實用性沒有。”

通俗史的缺點是把古今混為一談，優點也是把古今混為一談。老百姓沒有歷史，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怎麼活都是個活。

通俗史喜歡比附古今，但李零希望的是穿透古今。穿透的關鍵，是取旁觀態度，沒有這種態度，不能超越自我。

中國爭奪眼球的熱是一波又一波的熱，現在的史學熱，熱的不是那些皇皇史籍。有本事、有決心抱著《二十四史》、《資治通鑑》讀下來，能有幾人？熱的是央視的“百家講壇”。講史總比人言籍籍的“戲說”強，捏造虛構、悠謬傳統、三真七假，隨心瞎掰、忽悠百姓。但借助主流媒體一夜成名的講史人一旦“星光燦爛”，各個都成了百寶箱，什麼都懂，什麼都能說，講史又變成說書，賣座率漸漸下降。央視的“百家講壇”千方百計動員李零出鏡，李零總是婉拒。無論中央臺，鳳凰臺多麼言詞懇懇，李零的說法：“我特怕看電視中我那張臉。”

文化立場問題，實際上裡頭包含了許多現實問題。文化立場問題不是一個歷史上我們關不關的問題，許多的考慮，現實問題都繞不過去。中國文化，亞洲、東亞、伊斯蘭文明，北非、美洲、大洋洲和歐洲文化的關係，現在看來，離開哪個都形不成資本主義文明。資本主義從它一產生就是國際的，制高點一旦形成，天似穹廬，籠蓋四野，羽翼豐滿，威絕四海。按它的需求排隊。西方發展到現代，“人權高於主權”——鬼子學會了許多東西只做不說：文化立場問題，對鬼子來說是只做不說的，但是處處都會碰上，如對待婦女，對待黑人，對待伊斯蘭文化等等。

用西方立場讀李零，很容易將李零誤讀成民族主義者或文化保守主義者，這等於將吃中國菜，講中國話，用方塊字都擴大成民族保守主義。

西方人說的好多國際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大地方主義，這種國際主義一向是李零反感的。他總是反問，你不喜歡歐洲嗎？你不喜歡西方文化嗎？馬上對方就不敢說了。

歐洲中心論是他們根本改不了的死結，強勢的西方文化是他們的主心骨，所謂國際就是西方文化。“任何文明別跟我較真兒，

你早晚要朝我這兒走，我不和你分彼此。”但你真和他學是學不成的，誰學得最好，比如德國和日本，他就會揍你，西方所謂的沒有什麼國家立場，是胡說八道。西方文化本位，絲毫不掩飾。李零深深地懷疑的就是這種文化立場。

瞭解了西方文化立場，就比較容易瞭解西方人看歷史的方式，從文化觀到歷史觀，西方那種文化優越感是情不自禁，掩飾不住，揮之不去的，如《劍橋考古史》、《劍橋戰爭史》，西方人創造的最高理想國就是美國，而美國是最國際化因素的產物。《劍橋戰爭史》是美英典型文化歷史觀的產物。

在歐美，除了少數漢學家，其他各種學家都不瞭解中國。《劍橋戰爭史》敢稱世界戰史，言必稱希臘，沒有東方，從希臘、羅馬重裝步兵到海灣戰爭，所謂持久正義。中國歷史上的強勢文化也一樣，認為不需要特別瞭解其他少數民族的弱勢文化，也是大漢族中心論。想瞭解東方戰史，看馬克·路易士《合法、被批准的暴力》，其實這本書也是西方文化觀的產物。

西方人的優越感確實有一定道理，絕對支配地位，戰爭從來只有強者的話語權。“我用戰爭求和平，跟你不分彼此，樹榜樣，看人家日本，全盤西化，脫亞入歐，美國是歐洲的產物，亞洲只有日本。歷史上說中國戰爭經驗多豐富，兵法如何發達，反正你們在近代是我們的手下敗將，你們的好東西，我們照單全收了”，“受之有愧，拒之不恭。”人家是國際慣例。國際文化還在允許你，吸收你的中國菜、中國功夫、中醫中藥……然而你就是不行，這一條是鐵定的。西方的核心價值觀，普世原則，表面是自由、民主、人權，軟肋是戰爭文化。

從文化優越感到歷史優越感，以現代劃線，西方從來都素質好，有公民意識，戰鬥力強，毫無保留地消滅對方，包括征服美洲，殺盡印第安人，理直氣壯，大言不慚，沒什麼可臉紅的。而我們中國是忽而自大，忽而自卑，講中國先前如何闊，你跟外國一講就氣短。

我們學西方，學得一塌糊塗，講破天，也改變不了今天的世界格局。你再學也學不到人家鬧起來的全部國際化過程，過了這村沒這店。拷貝複製的結果不言自明，人在江之頭，君在江之尾，座次早已排好，你排在非洲、南亞前頭，你就感謝上蒼吧。李零的文化立場不是非此即彼，黑白對立的好壞人故事，而是很中性：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人類的感情不相通。人與人的區別比人與猿的區別還大。

政治是禁忌，宗教是禁忌，雅俗也是禁忌。

信仰是不能討論的。

就連一部《紅樓夢》都少有共識。魯迅先生在〈《絳洞花主》小引〉中說得精道：“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² 而毛澤東自有獨見，他說《紅樓夢》是歷史書，第四章是總綱，寫了四大家族，其他章全是目，綱舉目張。他看到的是階級與階級鬥爭。公理、婆理，李零想讓天下的道理講成一個道理，志存高遠而實不易。

西藏的“3.14”事件和當年的炸我南斯拉夫大使館，讓當代中國人明白點。西方人和你談西藏問題，你和他談對等的魁北克問題、科西嘉問題，為什麼西方將一個庫爾德民族切分到五個國家？他會認為你是外星人。

左派和右派，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沒法談得攏。正是因為信仰不同，所以都要和平共處，碰到敏感問題，最好躲著點。

如果皆大歡喜，只能對這三大禁區繞著走。但沒有這三部分讀者，剩下的讀者也就寥寥可數。李零悲觀是悲觀在這裡。

李零說：“書寫出來，就不再屬於自己。我這個人，有點不

² 魯迅：〈《絳洞花主》小引〉，《魯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 年，第 419 頁。

識時務，逢左必右，逢右必左。右派把我當左派，左派把我當右派，可能皆大生氣。左派把我當左派，右派把我當右派，可能皆大歡喜。我管不了。但我期望的讀者，是把天下的道理當同一個道理。富兮窮之所依，窮兮富之所伏。”

敵人的概念，三天兩頭變。敵人也是人。

我們不能“兩個凡是”：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一定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一定擁護。敵人吃飯不吃屎，我們不能反過來，專吃屎，不吃飯。

帝國主義不是一個陳年往事。李零是反帝不臉紅。

美國把自己的國家安全建立在對國際事務的強暴干涉和窮兵黷武上，一切以他們的一己私利為轉移，他們家的事就是全世界的事，全世界的事都是他們家的事，這種態度當然該反對。

中國的萌芽論，錯就錯在沒有世界眼光，好像人家不來帝國你，你自己也就資本主義了，哪有這事呀，不懂人家的前提。前提是你別搗亂了，單一國家，就算超級大國也不可能單獨產生資本主義。你說中西醫結合當然好，但西醫比中醫講科學高於中醫是前提，你的定位早就替你選好，如同唐人街、印第安保留地。³

現在有人講西方科學高，中國道德好。好什麼好？首先中國的公德就是世界上臭名遠揚的，需要進口。想和人家平起平坐，是白日做夢，只能爭得一席之地。人家只做不說，我們是不做敢說。什麼“伊斯蘭文化極其野蠻”，“黑人在各方面都低劣”，美歐不敢這樣講，更別說“弱者”，你的名字叫女人。國家利益至上，人家從來是這樣做的，一戰，二戰，美國人連老祖宗英國的願望都不照顧，而是下決心削弱英國。

面對西方強勢的文化歷史觀，中國人當然要反思。李零的反

³ 李零：《李零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4~16頁；李零：〈讀動物農場〉，《讀書》2008年第8、9期。

思與多數人不同，不是快意恩仇，而是條分縷析。

中國真反西方嗎？讀讀近代史吧，很多反對，其實都是追隨。比如軍事，那是專門對付外國的，但學得最兇。敵人是最好的老師。

我們喜歡反身邊的事，遠的不但不反，還奉若神明。美國也不是鐵板一塊。身邊的不合理是小巫，遙遠的不合理是大巫。小巫見大巫，矛什麼盾？

中國的知識分子，是走與美國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

李零對強國夢和人民大爺都有所保留。不是反對，而是保留。

強國夢是西方的饋贈，躲不開。最好是不欺負人也不受人欺負，但分寸很難把握。挨打要反抗，不能反抗也該反對，這沒有錯。

人民群眾是水，水可載舟，也可覆舟，特點就是傾側反覆。一滴滴的水，平靜流淌的水，很可愛。但匯成洪流，相當可怕，特別是從政治的、宗教的閘門放出來。

有幾流的國民，就有幾流的政府。

暴政後有暴民，暴民之後有暴政。這樣的大戲在中國上演了幾千年，在世界上演了幾千年，中國有不稀罕，世界有常忘記。大戲演到文革，好像是一個人自編自導的。

“文革”反省的最大困境：“文革”後，大家都是好東西，“四人幫”可以抓起來，但直接施暴者誰也沒轍。其實，“文革”的恐怖，李零印象最深的，還是群眾暴力。包括被稱為“知識分子”的群眾。知識分子都是知識分子整死的。

歷史事件，不能光講政府行為，而且把它道德化，變成桀紂式的符號。“文革”這臺大戲，絕不是四個人或一個人就能上演。中國人特別健忘，一句“被‘四人幫’迫害致死”，就大家都是好東西，一切都忘他娘。“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

該反對的都該反對。

在英美，民族主義實際上就是國家主義，罵落後國家，可戴這頂帽子。但他的自豪感、國際性、國家至上、民族主義無處不在。

他自詡“國際”，嫌你搗亂。你若心悅誠服，全面接受，甘做附庸，他給你一席之地，分你一杯羹，這是西方國家的文化基本立場。

二、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全球化

另外一個值得反省的歷史，就是西方資本主義是怎麼出現的？許多人都很關心，現有的書都是歐洲中心論的成說，觀察得正確與否，決定性的還是文化立場。列寧寫帝國主義論，9.11 之後美國有一本書為帝國主義平反（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什麼美麗的帝國主義，還有什麼新羅馬帝國，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為帝國正名。共識是 19 世紀很關鍵，這個世界的基本東西都是在那個時代形成的。何以如此，請君聽我慢慢道來。

20 世紀前 50 年，打了兩次世界大戰，殺人上億；後 50 年是恐怖的和平，冷戰，是核武器鎮住敵對的雙方，立場並沒有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社會化的大生產和社會化的佔有形式，致使生產力越落後的國家越革命：一戰是落後的俄國革命，二戰是比較落後的國家組成社會主義陣營，更落後的中國革命了，生產力更落後的波爾布特統治下的柬埔寨進入瘋癲。一個比一個更野蠻，更激進。全球病灶還是帝國主義的遊戲規則。對內是共產黨整共產黨，對外是帝國主義與社會帝國主義進行冷戰，發達的更發達，發展的永遠在發展，而且差距越來越大。歐盟 15 國 13 個社會民主黨上臺掌權，對內更仁慈，對外更野蠻。對內，弱勢群體反抗出成果；對外，此歐盟就是彼北約，肢解南斯拉夫，炸我中國使館，別人說大變特變，李零看到的是萬變不離其宗。蘇聯解體，東歐易幟，自己整垮自己，歐美認為是自由主義的勝利，“歷史的終結”。資本主義的生命力經久不衰，但它到底是怎麼來的？

黃仁宇提出大歷史觀，看清資本主義要上溯五百年，“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有的左派認為資本主義是不斷變化的皇帝的新

衣，皇帝的本質是不變的（Frank）。實際上資本主義的產生就是國際的，它的產生不是一個單獨的來源，而是全世界，十分國際化的諸多因素，激烈碰撞隨機耦合，是前世界體系裂變的結果，所以產生是國際的，結果也是國際的。⁴

西方史學家越來越看到資本主義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更不是西方自己的傳統特別優越，正如王小強研究指出，西方不是從希臘、羅馬時就根紅苗正，更不是先進得其他兩個文明都無法比擬，無法抗衡的文明。但從六百多年前中世紀最野蠻、最落後狀態中突飛猛進的西方，後來居上，對它的認識，要搞清楚的是大本大源，要解決的是大是大非。

資本主義是全人類文化的共同產物，資本主義的形成要有亞洲、美洲、非洲各種物質的、文化的文明為其生長做營養基，美洲自然不可或缺，但沒有中國的“四大發明”，政教分離的國家模式，大一統的郡縣制度，非貴族化的科考選士制度，資本主義文明也無從產生，更離不開幾大洲的廣闊市場和取之不盡的勞動力資源。非洲人成了他們的黑奴，缺一環都不能形成資本主義。所謂的大國崛起，其實都是小國崛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證明：有了美洲大量的白銀之後，西方與中國進行貿易，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工藝品總是貿易順差，西方的白銀 60% 以上流入了中國，在貿易上戰勝中國，靠鴉片和鴉片戰爭。

西方的優越感，實際上也是全人類共同的誤區，一種強勢文化以我劃線的誤區，也可以說是忘本。“過去就甬提了，天翻地覆完全不一樣了”。李零認為歷史學家的一大錯誤，以為人類在資本主義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人類的變化總會有的，但有些基本的東西是不變的，如蘇東坡遊赤壁，今人、今水、今月亮，明月何時初照人？逝者如斯夫，“蓋將

⁴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三聯書店 1997 年，第 1~3 頁。

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變的背後有不變的東西，天地之變就如眨眼，一瞬間，一剎那。人類也有永遠不變的基本興奮點，不變的主題。

西方史學一直切割得很厲害，他們特別強調傳統和現代的區別，以現代化劃線。香港城市大學的張信剛認為現代化的概念總是不斷變化的，沒有固定標準。過去以攝入多少卡路里為標誌，但現在又在改變。現代化如何定義？現代化等於一個現在時，很快推進到將來時，李零在質疑西方，為什麼要有這麼一種現代觀念？傲視別人過去？當然西方也傲視自己的過去，但更傲視其他文明的過去。

有識之士都看到了古代和現代有許多共通的地方，古代和現代，中國與外國，今人與古人都是可打通的，古人不比今人傻，今人不比古人精。王小強論證過中國古代也有相當發達的商品經濟，按馬克思主義的通俗說法，25%的產品剩餘和25%的剩餘勞動力，資本主義就可以萌芽了，這種萌芽說，一直可推到中國的秦漢。馬克思的眼光還是資本的原始積累，只是觀察同一問題的角度單向。李約瑟證明中國古代也有相對而言發達的科學技術，有人將中國忠臣諫士對抗暴君，視為民主精神。法國人文學者認為中國皇帝也有宗教功能，他們發現教皇也有許多世俗功能，說來說去，一方面西方的漢學家劃分得非常細，一方面他們的文化立場是既定的，雷打不動的，中國的歷史分析，西方漢學家根本不感興趣，他們主要是以己劃線，古代就是古代，現代就是現代，李零深深懷疑這種劃線的立場、觀點、方法。

不必說兩河流域的亞述、巴比倫文明早於也先進於凱爾特人的歐洲文明、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也不必說，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後，四大哈里發相繼執政的“共和時期”（公元632~661年），東方比西方先進。單就伊斯蘭教帝國階段，倭馬亞王朝、阿拔斯王朝，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同期相比也望塵莫及。

公元八世紀伊斯蘭再次擴展，西至歐洲西南部伊比利亞半島

（西班牙），東抵中亞和印度西北部信德地區，形成了地跨歐亞非三洲的阿拉伯 — 伊斯蘭帝國。廣袤的帝國裡居住著穆斯林各族人民，從阿拉伯人、波斯人到中亞突厥各族和印度人，他們共同創造了高度發達的阿拉伯 — 伊斯蘭文化。毫不誇張地說，穆斯林已成為東方 — 波斯印度文化和西方 — 希臘羅馬文化遺產的當然繼承人。特別是從九世紀到 13 世紀帝國覆滅，尤其是九世紀中葉以後一百年裡，這是阿拉伯 — 伊斯蘭文化的光輝時期。世界上最好的圖書館、天文臺、醫院均在這個地區。巴格達、開羅和西班牙的科爾多瓦成為世界文化中心。巴格達智慧宮藏書 200 萬冊，此外這座城市還有 30 座圖書館，個人可以借出 200 冊圖書。開羅法蒂瑪圖書館藏書 100 萬冊，科爾多瓦圖書館藏書 70 萬冊。阿拉伯語成為帝國境內通用語言。希臘歐幾里德幾何學、托勒密天文學和阿基米德物理學統統都有阿拉伯文譯本，有的還不止一種。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及其門人的各類哲學、倫理學、邏輯學、修辭學著作，都有經過了阿拉伯人考證、勘誤、增補和詮釋的譯本。11 世紀巴格達尼采米亞大學、開羅埃資哈爾大學、西班牙科爾多瓦大學都已經分系建立神學以外的學科，如天文、醫學和數學各系，並接受歐亞非三洲留學生。據說歐洲早期巴黎大學分系的設想便是直接受此啟發。

然而同一時期的歐洲又如何呢？歐洲正處在榛莽荒野之中。歐洲已被蠻族入侵搞得疲憊不堪，四分五裂。過去他們把這段時間稱為“黑暗時代”，直到最近才有些改口。歐洲的諸侯們盤踞在碉堡裡大字不識一個，封建領主的馬廄裡堆放著腐爛發臭的希臘羅馬先賢們的著作，查理大帝宮廷教師教授皇子的教科書幼稚得令人忍俊不禁。惟一有文化的階層 — 基督教士們也只能教些簡單的拉丁文字母或者討論諸如“一個針尖上究竟能站幾個天使”這類荒唐古怪的問題。黑暗的隧道直到 14~15 世紀才走到盡頭，歐洲早期文藝復興開始了。人性復蘇了，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價值和意義被重新

認識和發現了。可是“復興”的希臘羅馬文化從哪裡尋找？歐洲人如夢初醒地想起了阿拉伯人以及他們的文化。阿拉伯文本，被歐洲人從 12~15 世紀譯成拉丁文和西方各種文字，歐洲各大學以此為教材長達五個世紀之久。西班牙的長利多城曾經成為歐洲學習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泉源和中心，那裡設立的翻譯局直到近代以後方才結束。想想看沒有阿拉伯人同他們的文化，歐洲的文明會是什麼樣子？近現代的歐洲又會是什麼樣子？從這個意義上講，阿拉伯文明是近代歐洲文明的橋樑，阿拉伯人是歐洲的“恩人”。可是西方人是怎樣對待這座橋樑和這位“恩人”呢？從 15 世紀西方人開始發現新航路認識新世界第一天起，他們就沒有停止對亞非人民的殖民掠奪，直到 20 世紀開始亞非所有伊斯蘭教國家無一不淪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二戰以後這些國家紛紛獨立，善良的阿拉伯人民在民族主義領袖們領導下，或仿效西方建立代議制政府，或學習蘇俄建立社會主義體制的國家，然而沒有一個國家是成功的。經濟上積貧，政治上積弱。昔日民族主義的領袖許多墮落為獨裁者，幹部腐化、貪婪、納賄，人民暗無天日，前途渺茫。人們自然而然回憶過去伊斯蘭帝國的光輝日子。回到過去，回到《古蘭經》去，便成了他們的心聲。Fundamentalism 便從這裡產生。⁵

哈佛的亨廷頓教授代表白種人的價值觀，他的《文明的衝突》告誡西方，他最擔心的是中國儒教文化同伊斯蘭攜手合作給西方文明以鉅大威脅。世界岌岌可危，人類末日指日可待。這仍是西方中心論的慣性思維，西方的普世的文明從來是暴力帶來暴發。⁶

西方的暴發是如何來的？

西方在古代並不先進，西方受惠於阿拉伯世界，包括波斯文化，

⁵ 伍貽業：〈世界不會大同〉，《讀書》1999 年第 6 期，第 52 頁。

⁶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 2002，第 276 頁；《我們是誰？》，新華出版社 2004 年，第 208~209 頁。

受惠於亞洲地區和亞洲文化。這一段，西方人含羞垢恥，特怕提起。

西方人寫戰爭史分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重裝步兵，是農業文明的產物，中國比希臘、羅馬先進一點，是車兵和步兵混合作戰。其實只有草原文明的騎兵才是無敵之軍，這是古代的現代化部隊，中國元朝，蒙古人佔領了五分之三的歐亞大陸。這一問題上我們沒有必要堅持大漢族主義。不能說中國打蒙古，蒙古打伊斯蘭，伊斯蘭把火藥學去了，中國的蒙古人先征服了中國，然後打到歐洲的波蘭。孫機先生說歐洲人怕匈奴，阿提拉是上帝的鞭子，上帝就是中國，中國戰勝了阿提拉，他就西躡，到歐洲卻稱王稱霸。中國的火藥也是由中國少數民族，蒙古族傳給西方的。

第二階段是中世紀的城堡攻守之戰，中國的蠻族，騎兵征服了城堡。劍橋戰爭史第二階段是城堡時代，原來的羅馬軍團很自豪，但他和從丹麥、荷蘭等北方過來的人相比，無論身高、身體素質都沒法比，人家還有數量相當的騎兵，先是僱傭日爾曼人，後來也引進了騎兵，整個中世紀的戰爭，逐漸發展了築城技術。

中世紀的城堡是被火藥炸開的。現代的槍和炮實際上是古代的弩戟和投石器與火藥的結合，前者成槍，後者成炮。火藥和指南針決定著他們的根本命運，四大發明一樣都不能缺少。其實何止四大發明對西方的躍遷起了關鍵作用，只是有了火藥和指南針西方才可能進入第三階段，即艦船和槍炮的時代。西方的船原來連舵都沒有，大海航行靠舵手，當時中國的舵技術世界第一。中國的炮也很了不起，但中國的炮多半是用於守城，不是用來進攻。像鐘錶、槍炮從中國傳出，人家不斷改造，變成攻城掠地的利器，中國反而要重新引進。西方現代比你厲害，這點你不能不承認，但承認並不等於不能批判，不能因為現在我比西方落後，我們自己身上有一堆的毛病，就不能批判西方。⁷

⁷ 傑佛瑞·派克等：《劍橋戰爭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184頁。

西方文明的躍遷不僅僅離不開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阿拉伯文明等，也離不開美洲，如果沒有美洲的土地，物種（煙草、咖啡、馬鈴薯、玉米、紅薯等），美洲的白銀和諸多原料，西方的新興產業根本無法形成，特別是英國人發家的紡織業，根本無法起飛。歐洲人口少，三大文明圈中西歐不沾邊，西亞、北非、南歐是一個文明圈，邊緣是西歐人，三大文明圈，歐洲最落後，西方人自己調侃，中國發明的牙刷、竹鹽牙膏、皂角肥皂，將西方人從黑死病中解救出來。

西方的文藝復興是從阿拉伯取經取回來的，但是西方人的傳教與取經都是依靠暴力。希臘、羅馬傳統上就對外征伐。你看亞平寧半島，波羅奔尼撒半島，農耕的條件自古無法與中國比。中國很早就形成統一的大國，季風氣候，四季分明，農耕有序，地大物博，南北東西各不同，當然市場經濟就比較發達，信用制度也相對發達。大一統的集權國家比奴隸制的民主國家先進，這是不爭的事實。

西方的啟蒙時代，尤其是 18 世紀的啟蒙思想家有許多對中國的謳歌，甚至認為中國的今天就是歐洲的明天。但當時歐洲就有兩種態度，伏爾泰、狄德羅是歌頌派，但也有像孟德斯鳩這樣一些唱反調的人，當時歐洲，其實今日歐洲還保留著國王一大堆，小國一大片，車不同軌，書不同文，也沒有統一的度量衡，歐洲統一貨幣，大一統剛剛開始。

秦始皇的那一套，在歐洲還是進行時，歐洲生產力革命，所謂大國崛起，是拿破侖對歐洲內部無法統一就想辦法到外部去搶。拿破侖打俄羅斯，想一口鯨吞，貪多嚼不爛。其他帝國都是小國崛起，到歐洲之外蠶食四方。人類的以強欺弱，綿綿不絕，中國也一樣。春秋戰國，秦國是一超獨霸，統一六國的最後一幕肯定是弱者兵法的恐怖主義，荆軻刺秦王的一幕必然出現。現在上博出土的曹沫兵法。曹沫就是曹劌，出身卑賤，心狠手辣，齊強魯弱，簽訂不平等條約，曹劌一把揪住齊桓公的脖領子，要拼命。初中課本裡學過。“大王之怒服屍百萬，流血千里”，而持質，“流血兩人，天下縞素”，“一

人拼命，萬夫懼之”，比的就是窮人的命和富人的命不等值。

研究中國的戰爭史要注意過去比較忽視的戰爭史，比如匈奴列傳，因為中國人會打仗是向匈奴學習，匈奴很厲害，流動性極強，擅長恐怖戰術。漢族的弱點是由農耕所形成的居有定所，成群扎堆。匈奴是高度流動，人比蒼蠅、蚊子厲害，但蒼蠅、蚊子亂飛亂跑之中，照樣吸血吸食，佔你人類的便宜，而且沒完沒了。所以，一定要看匈奴列傳。你看匈奴聲東擊西，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一過長城，天蒼蒼，野茫茫，漢兵就不敢追了。中國還有一個特點，農民戰爭最發達，與黑社會有很深的淵藪。還有獨行俠，也是兩面看，單挑獨打，鬥狠鬥勇的也可能是刺客，反帝反霸也可能是刺客。現代的劫持人質，古代叫持質，這要讀遊俠列傳，中國古代很現代，可以說世界最早的恐怖主義，弱者兵法，生於斯，長於斯。劫持對象一是有錢人，二是當官的。美國的人權觀念是雙重標準。美國人在 9.11 之前最反對見義勇為，對內特別仁慈，對外特別野蠻，上層特別高雅，下層特別愚昧，對內看似很文明，對外是變著方殺人。

三、古代的現代化和現代的古代化

古代的民主共和國和羅馬法典，真是十分現代化，是現代西方的鼻祖，無論是海洋法系的國家還是大陸法系的國家，都認祖歸宗。但古代的希臘、羅馬時代極其殘酷，和其他兩大文明不同，典型的奴隸制，全世界最發達的奴隸制就生於斯，長於斯。希臘、羅馬也是農耕文明，土裡刨食，但是與古代中國比物產十分單調，沒有什麼像樣的大平原。他們的貴族、平民很少從事農耕，而是培養戰士，他們四處攻城掠地，殺人如麻。原有的私有制不能動，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賞什麼？新奪得的土地、奴隸、包括女人。對外殺人征伐，血流漂杵，金戈鐵馬，對內才能搞民主制。古代的民主制國家是這樣產生的，現代民主制國家也是這樣產生的。

平民是大多數，就要有議會制、護民官、法制、民主共和國、公民權利。你看西方的樣板戲《斯巴達三百勇士》、《亞歷山大》就會明白。窮人永遠是大多數。西方人總是把自己從古打扮得根紅苗正，個個都威武雄壯，“高大全”，而其他文明在他們眼裡是邪惡。後來的後搶者德國、日本是他們最好的學生，二戰時對外殺人如麻，對內歌舞陞平。這種文明的集大成者就是美國，世界幾乎所有人都愛美、恐美，對外，美國在冷戰之後永遠是戰爭狀態，找啊，找啊，找敵人，找到的是“綠禍”和“黃禍”。

李零的新著《讀〈動物農場〉》，引用了段奧威爾語錄，描述得十分精彩：我們都是靠搶劫亞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們中間那些“開明人”都認為這些苦力應該得到解放，但是我們的生活水準，因之也是我們的“開明”，卻要求這些搶劫繼續下去……（喬治·奧威爾評吉卜林的文章）

李零這樣講：冷戰時期，曾讓太多人感到絕望，特別是夾處於美、蘇之間的歐洲人。比如英國的“憤青”（憤怒的青年）憤什麼？就是二次大戰的“英雄”還霸佔著這個世界（奧斯本《憤怒的回顧》）。

現在，老一代的“英雄”差不多都已離去。他們留下的遺產是什麼？一是戰爭，二是革命。它們的變奏，構成了《動物農場》的主題。

必也正名乎？奧威爾的書，《動物農場》和《1984》，共同主題是批判極權主義。什麼叫極權主義？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在西方的政治辭彙中，有兩組詞，黑白分明，最能體現西方的價值觀：

（一）好詞

（1）freedom（自由），和下面的詞是同義詞。只不過，liberty是借自法語，freedom才是英語本身的說法。

（2）liberty（自由），有“解放”之義，我們常說的“解放”，

其實就是“自由”。美國的“自由女神”是“解放女神”。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其中的“自由”（liberté）就是相當這個詞。一般說，擺脫奴役才有自由，自由是解放的結果，但英美革命的繼承人卻喜歡說，解放是自由的結果——守法即自由，沒有規矩的自由是不自由。

(3) equality（平等），主要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國大革命的口號，其中的“平等”（égalité）就是相當這個詞。《禮記·禮運》的“大同”、《墨子·尚同》的“同”，庶幾近之。

(4) fraternity（博愛），意思是手足之情、兄弟之情。法國大革命的口號，其中的“博愛”（fraternité）就是相當這個詞。孔子弟子子夏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庶幾近之。

(5) democracy（民主），是希臘老詞，本義是人民統治。歐洲政體，古典時代是分爲三類六種：君主制（monarchy）和僭主制（tyranny）是一人統治，貴族制（aristocracy）和寡頭制（oligarchy）是少數統治，共和制（republic）和民主制（democracy）是多數統治。亞里士多德說，這三組詞，都是前邊好，後邊壞：君主制最好，貴族制其次、共和制又其次；民主制是暴民政治，寡頭制和僭主制是暴君政治，都不好。可是現代政體，流行的卻是民主制。即使君主立憲，也是虛君共和，有沒有君主無所謂，關鍵是不能沒有議會。

請注意，這些好詞古今中外也可以切換打通，都有具體的時代指謂，抽象的“好詞”東西方照樣談不攏。

（二）壞詞

(1) autocracy（獨裁），是從 autocrat 來的。autocrat 是獨裁者（auto 是自己，crat 是統治）。我國帝王，稱孤道寡，唯我獨尊，西周時期，叫“余一人”，最像這個詞。這種一人說了算的統治者，在我國，那是司空見慣，並不都叫暴君。中國的暴君，那

得“獨”到一意孤行、誰勸都不聽、隨便殺人、近乎虐待狂的分兒上。如武王伐紂，把紂叫“獨夫”，就是這種暴君。

(2) dictatorship (獨裁)，來源於 dictator。dictator，本來是羅馬共和國的民選執政官，通常有兩名，羅馬帝國的皇帝就是從大權獨攬的執政官發展而來，後來引申為“獨裁者”。卓別林的《大獨裁者》(The Great Dictator)，就是用這個詞指希特勒。過去，我們常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獨裁”。馬、恩和列寧認為，革命勝利後，無產階級為了鎮壓敵對勢力的反抗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必須如此。專政是過渡手段，下一段才是社會主義。

(3) despotism (專制主義)，despot 是暴君。暴君哪兒都有，沒什麼新鮮。比如希臘的僭主 (tyrant)，還有某些羅馬皇帝 (卡利古拉和尼祿)，就是西人常說的暴君。他們的傳統是小國傳統，對暴君很敏感。我國，秦以後的皇帝，以武力取天下，沒有貴族出身，有點像僭主。春秋的趙簡子和陳成子，漢魏的王莽和曹操，權力很大，也像僭主，但我們不叫暴君，只叫“亂臣賊子”或“亂世奸雄”。

(4) absolutism (絕對主義，或絕對君主制)，學者多把這個詞翻成“專制主義”，如中文版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就這麼翻。我國常說的“專制主義”，是個沒有歷史概念的混沌。其實，absolutism 這個詞，和 despotism 還不完全一樣，它是專指資本主義前夜，高度集權的君主制。這種君主制，是和等級君主制相對，是和權力分散的封建制相對。它在歐洲，興起和衰亡，時間不一樣，主要在 16~19 世紀這一段 (俄國拖到 1917 年)。如法國的路易十四、普魯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俄國的彼得大帝，都屬於這類君主。歐洲各國，絕對主義越發達，革命越激烈，法國和俄國就是如此。absolute 的意思是絕對的。法王路易十四說“朕即國家”，就是這種絕對主義。最近，劉北成、龔曉莊翻譯了佩里·安德森的《絕對主義國家的譜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就是介紹這類國家。

(5) totalitarianism (極權主義)，是 20 世紀才創造的新詞。極權概念的發明者是意大利哲學家秦梯利 (Giovanni Gentile，或譯金梯利，1944 年被意大利共產黨殺掉)。1920 年代，極權的概念經墨索里尼宣傳，廣為人知。這個詞是法西斯主義的代名詞。total 的意思是全面的或總體的。它強調的是黨國至上、集體主義、絕對服從和軍事化。totalitarian 是全面控制社會的大獨裁者。它的特點是全面控制：全面控制社會，全面控制個人，比傳統的專制主義和絕對主義更加專制，董樂山主張譯為“全面權力主義”。漢娜·阿倫特有《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 年)，據說北京三聯將出譯本。

層層剝筍。上面的好詞，全是文藝復興、啓蒙運動和歐洲革命的遺產；壞詞，除極權主義晚出，全是前資本主義概念。它們彼此相反，有如堯、舜與桀、紂。

李零指出，民主與專制捉對廝打，相互纏鬥了幾千年，源本是非要具體分析。

西方人的麻煩，是有一個綿延六百年的黑暗中世紀，一點兒民主都沒有。所以，西方人愛講民主，追根溯源肯定是希臘城邦，誰都是爸爸不親爺爺親，反認他鄉為故鄉。民主不僅僅是小國傳統，它的根源還在史前社會，中國舜、堯時代的傳統，西方凱爾特人的早期文明，世界各大文明，早期都有這一段。國家由豪酋而王，由王而帝，由小到大，先民主後專制這是進步。

西方人拿希臘城邦說事，顧准的文革之痛，痛定思痛，也拿希臘天邊的民主批眼前的專制，也是拿希臘城邦說事。

希臘環海而多山，農業條件差，但便於海外擴張，玉帛、女子，可以到海外搶，中國馬背上的少數民族和希臘的海盜傳統，陸上搶和海上搶，同一個硬道理。希臘城邦，一堆小國，古風猶存，還保留民主制。但李零講，即使希臘，也有六種政體，並非只有民主政體。

古希臘，一堆小國，鬆散聯合，居然打敗比他們強大的波斯帝國，很讓歐洲人自豪。亞歷山大征波斯，橫跨歐亞，建立龐大帝國，猶“小邦周克大邑商”，是希臘的頂峰，西人特愛吹，叫“希臘化時期”。但他一死，土崩瓦解。

同樣，羅馬早期也有民主制。他們擺脫共和，走向帝國，也是順理成章。羅馬帝國，後來居上，更龐大，更發達，但即使走向帝國，也還保留城市自治，國家依然很鬆散，難以控制各地的反叛和阻擋北方蠻族的入侵。

中世紀南下的蠻族，類似我國的匈奴、鮮卑，本來也很民主。他們的入侵，也是“小邦周克大邑商”。龐大的羅馬帝國，讓他們一衝，也土崩瓦解。他們的佔領，不像我們的西周封建，是歸同一個王來領導，更像五胡十六國。今天的歐洲，小國林立，書不同文，車不同軌，就是承受這份遺產。

歐洲，大地域國家不發達，小國寡民的記憶特別深。即便現代大國，也多半是靠海外殖民複製的聯合體，很像城邦自治的古典時代。文藝復興，他們是“爸爸不親爺爺親”，寧肯認同希臘、羅馬，好像特民主。但他們也熱衷過專制，不止一次。

歐洲走出中世紀，一度提倡專制：抬君權，壓教權，抬專制，壓封建。18世紀，他們還羨慕過我們的專制。

插過隊的人都知道，中國最講民主的地方是農村，村裡人低頭不見抬頭見，什麼事都要商量商量。就是“文革”中評分，也是大家聚在一起一評一晚上。全世界都一樣，最不講民主的是軍隊和大公司，它最講效率，卻最不講民主。

當然，這種專制，早已不是什麼傳統意義上的專制，而是上面說的絕對主義。好聽的說法是“開明專制”。絕對君主制取代等級君主制，權力太大，威脅市民社會，引起反彈，才有後來的革命，申民權，抑君權，再掉過頭來反專制。

他們是反封建在前，反專制在後，專制是封建的對立面。

歐洲的君主制，上有教權（宗教大一統），下有封建（國家多元化），王是小王，帝非常制。他們的帝，源出羅馬，拉丁系的國家叫皇帝（imperator，原意是得勝的將軍），日爾曼和斯拉夫系的國家叫凱撒（caesar）。查理曼帝國、神聖羅馬帝國和沙俄帝國，是歐洲的三大帝國，帝號多出羅馬，一般要由教皇封。法西斯主義源出意大利和德國，這不是偶然。意大利的前身是古羅馬，德國的前身是神聖羅馬帝國。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一種插著戰斧的笞棒）是復羅馬之古，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也是繼承神聖羅馬帝國。他們都是託夢於羅馬。羅馬是帝制的象徵。

西方民主，是專制的對立面。但現代民主，中間隔著中世紀，並不來自希臘。它是歐洲革命的產物。革命的理想是破舊立新，革命的結果是折中新舊。

革命，是個意向紛紜的怪物，民主也是如此。革命，既有王冠落地，也有王權復辟。民主，也是既有英國立憲傳統和洛克的影響，也有法國啓蒙運動和盧梭的影響。民權挑戰君權和教權，結果往往是三權妥協。革命後的歐洲，不但教皇還在，九個國家還保留了王室。

當年歐洲的啟蒙運動、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確立了“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這種說法有悖於歷史事實。1789年的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其中的“人”和“公民”在法文裡，指的是男人和男性公民，更確切地說是男性白種人，不包括婦女、不包括有色人種、不包括華人、不包括窮人。在這個“人權宣言”通過兩年之後的1791年，一位名叫德古茲的偉大法國女性，駭世驚俗地起草了《女人和女性公民權利宣言》，但她卻被送上斷頭臺，她渴望的婦女投票權，直到她死後一個半世紀才在法國實現。

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也一樣，“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間的平等，不包括婦女、黑人、華工，也

不包括白人中的窮人，保留奴隸制也是美國國父們經過辯論後作出的選擇。

從 17 世紀開始的兩個世紀中，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是西方推崇的“普世價值”，他們談的自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包括了販賣奴隸的自由，包括了對印第安人進行種族滅絕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國傾銷鴉片的自由。美國的南北戰爭廢除了奴隸制，值得肯定，但戰後雙方還是作了政治妥協，認為美國“統一”的價值高於黑人“自由”的價值。美國不久又頒佈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種族隔離制度。這套踐踏人權的制度在美國又持續了近一個世紀。

從 19 世紀 70 年代開始，歐洲各國都迷信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迷信以惡報惡，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

操作精緻的民主，簡化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還編造了一個神話：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創造了西方今天的財富。實際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消費的資源比發展中國家多 30 多倍的基礎之上的。如果去掉這 30 多倍的差距，再看看西方的人權會是什麼水平？而西方的財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義之財？光是根據那幾個不平等條約，中國當年被迫支付給英國的戰爭賠款就足以在當時的英國建立一個完整的養老保險體系，而西方列強在那個時代強加給中國的可是一千多個不平等條約呀！問題是西方在推銷自己“自由、民主、人權”話語的時候，很少提及自己財富積累的真正過程：主要發達國家在其資本迅速積累的百年間，對外奉行的是野蠻的殖民主義，對內有選舉權的人幾乎從未超過本國人口的 5%。

艱苦卓絕的鬥爭。馬丁·路德·金 1963 年大聲疾呼：“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生活在一個不是以膚色深淺，而是以品格的優劣作為評判標準的國家”，而這離美國通過載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獨立宣言》已是 187 年之遙了。

最近，挪威特勒姆瑟大學社會和社團心理學教授佛洛伊德·

魯德明，在《偽善和危險的反華展示》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揭示了西方偽善的人權紀錄和雙重標準：“我們聽到‘種族入侵’和‘文化滅絕’的呼籲。但是，我們沒有聽到，這些話是應該適用於西班牙和法國警察們對待少數民族巴斯克人的。我們也沒有聽到，這些話適用於 1898 年美國吞併夏威夷王國時的情景。同樣的地方還有迭戈加西亞。在不算很久前的 1973 年，英國用武力從印度洋的迭戈加西亞島驅逐了土著查戈斯人，查戈斯人只允許攜帶一個裝有衣服的手提箱，除此之外再不允許攜帶任何東西，家裡的寵物被放到燃氣爐中燒成了灰燼。徹底的種族清洗，徹底的文化滅絕。這是為什麼？答案是為了建立一個美國的空軍基地。這個基地曾經用來轟炸阿富汗和伊拉克，接下來很可能用來轟炸伊朗和巴基斯坦。如今的迭戈加西亞島，除了英國和美國人之外已經沒有其他人居住了。如果要質詢、譴責西方的不法行為，這同樣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地方。”

如今，中國人需要非常鄭重和合法地懷疑西方作為“人權衛士”的資格，並可以這樣質詢西方：今天美國的本地人（印第安人）在哪裡，他們的文化和人權怎麼樣？澳大利亞的原住民在哪裡，他們的權利是否得到了尊重？丹麥是否妥善保護了格陵蘭人的文化權利？

我相信，如果中國真的有一天，非常不幸地實現了西方式民主，在經濟倒退了 20 年之後，還會像俄羅斯普京總統一樣，在社會政治領域建立“可控的民主”。這些措施：第一，堅決打擊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如發動第二次車臣戰爭；第二、削弱地方勢力，制止分離傾向。七大聯邦區的建立，首腦由中央任命，政治和經濟空前統一；第三、打擊寡頭，解決寡頭干政。如，打擊媒體寡頭古辛斯基、別列佐夫斯基，逮捕俄羅斯第一大富豪，尤科斯石油公司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經濟命脈的國家控股化；第四、擠壓反對派，結束議會紛爭，採取非常手段形成支持現政權的議

會多數。如“團結——祖國運動黨”，那是普京一手策劃、締造的第一大黨團。其實美國的共和、民主兩黨，對外、對內政策從沒有本質區別，可以說就是名稱不同的一個黨（典型的資產階級政黨）。我初中時看方成的漫畫就知道：“一頭驢，一頭象，除了外表都一樣”。⁸

西方的古代民主制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之上，西方現代民主制建立在殖民地制度基礎之上，壓迫別人自己才能民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才提出，民主也是國家，國家消亡，民主也消亡。有人說“民主是個好東西”。民主不是東西，是制度。專制是統治人民的手段，民主也是統治人民的手段。專制沾污帶血，民主也沾污帶血，頂多是歪鍋對扁灶。一個是對內狠，一個是對外狠。

極權主義不是歐洲歷史上的專制主義，而是個非常現代的概念。

法西斯主義是一次大戰和經濟大蕭條的產物。當時的歐洲，很不景氣，到處瀰漫著對民主和進步的絕望，權力意志的鼓吹甚囂塵上。大家希望，強者出面，收拾亂局，哪怕權力大一點。極權主義是20世紀的概念，不但和羅馬無關，跟中世紀也沒什麼關係。

極權主義是意大利法西斯的發明，純屬右翼概念，所有左翼都反對。但右翼罵左翼，也用這個詞。社會主義好一點，至少可以和民主掛在一起，歐洲左翼政黨，很多都是講社會民主的黨，甚至還是執政黨。共產主義就不行。他們說，蘇聯的社會主義和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一樣，也是黨國至上，暴君加暴民，這樣的社會主義是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是典型的西方話語。帝國主義瓜分世界，大局已定，所有國家，站隊劃線，壁壘分明，維持的叫民主國家，反對的叫極權國家（現在指共產主義）或民族主義國家（現在多以恐怖主

⁸ 丁一凡：《美國批判》，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9、45頁。

義稱之)。絕大多數國家，歐美和日本以外的國家，都屬於後兩類。這種劃分很霸道。

可惜的是，奧威爾無法區別於上述話語。對左翼來說，這是難逃的困境。

奧威爾說，他天生憎恨權威，但權威反不掉（參看恩格斯《論權威》）。暴君對他，是個揮之不去的噩夢。他的噩夢分兩種，一種是法西斯主義，一種是斯大林主義。他把兩種都叫極權主義。我們只有理解當時的氣氛，才能理解他的恐懼。當時的世界太野蠻——反對野蠻的，同樣很野蠻。

社會主義蘇聯和法西斯德國，一左一右，都挑戰過世界格局。它們都是帝國主義戰爭的產物：一次大戰，德國戰敗，倍嘗屈辱；俄國革命，強敵環伺，也被圍困。它們有同樣的創傷，同樣的困境。貧困和戰爭，扭曲了這兩個國家，二者頗具對稱性。可是，問題的根源在哪裡？正在格局本身。

凡爾賽和約，埋下二次大戰的種子；雅爾塔協議，也是冷戰的根源。在這種格局下，蘇聯的一切都是圍繞安全轉，對內對外，造成種種問題，很多戰略考慮，都被帝國主義化。這是革命的不幸。但只有站在格局的立場你才會說，它和法西斯德國是一家。

我們不要忘記，法西斯德國是最最反共的國家。他們和英、美的矛盾是由“瓜分”而引起，在“反共大業，同仇敵愾”上，他們和英、美是一家。

蘇聯的衛國戰爭，寫進《動物農場》，叫“風車戰役”。我們都還記得，皮爾京頓和弗里德利克是真正的一夥。當弗里德利克悍然攻打動物農場時，皮爾京頓說“活該”，他希望的是，弗里德利克替他消滅動物農場。

奧威爾絕不會同意，弗里德利克和動物農場是同一撥。這就像西班牙內戰，他雖痛詆左翼，恨其自相殘殺，但絕不會分不清左右翼。

他說，“這法西斯主義總得有人制止它”。爲了抵抗德國，蘇聯人民付出了最大犧牲（不光死人，還有制度上的犧牲）。

我們不能把蘇聯紅軍和德國法西斯混爲一談，就像我們不能把八路軍和日本鬼子混爲一談。

帝國主義戰爭引起社會主義革命，路徑的選擇恰恰與馬克思的預測南轅北轍。後發型的社會主義國家通通是經濟欠發達的落後國家。這些國家要生存，要溫飽，要發展。遊戲的規則只能按發達的帝國主義存在的格局進行。這是後發型社會主義的不幸，全球病灶是發達的帝國主義，它是這個世界的罪惡之源。

四、西方中心論和中華老大論

中國最幼稚的啟蒙派總是這樣提問題：你如果批評美國，你就是替中國的貪污腐敗、中國的一黨專制辯護。爲什麼一個人不可以既批評中國的腐敗貪污的同時，又批評美國呢？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不能說中國有問題，美國就沒問題，也不能說美國有問題，中國就沒問題。批評中國的問題首先要搞清楚中國問題的前提，比如中國經濟現在的結構性問題，中國給發達國家打工，在全球化的產業鏈中處於低端，所以表現出其產業結構是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你可以批評中國對勞動力，尤其是農民工很不公平，很不合理，拖欠工資、工傷事故、人身虐待，甚至出現奴工，批評中國同等 GDP 耗能高（低端 GDP 和高端 GDP 本來耗能就不同），污染嚴重。但是，你應該看清楚，美國為首的西方遊戲規則才是全球病灶。

全球化，有了資本滿世界流動剝削，而勞動力不能向發達國家流動的制度安排，發達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才可以通過資本向落後國家轉移而大大緩解，資源消耗和污染才能通過向落後國家轉移而大大降低。沒有東南亞國家的金融危機，就

沒有美國金融霸權投機賭博新經濟的三至四萬億美元的收入。西方的全球化，實質就是美國化。得罪了全球化的富人，外資不來，內資跑掉，投資環境不好，兩億多民工享有較高的社會保障，外資、內資沒有多餘的話，撒丫子就跑——用腳投票，印度、東南亞、非洲求資若渴，勞動力更便宜。

中國的現代化，改革自己，向發達國家開放，學生拼命學，老師照樣罵。中國有 50 多年未挨揍了，這是中共的歷史功勞，還不一定是常態。所以，首先要考慮的是老師的問題，美國的問題。美國的問題是大問題，中國的問題是小問題，小問題歸大問題管，這是全球化中的硬道理，這個道理隨著中國越來越現代化，會看得更清楚。只有像福柯這樣的人，吃著現代化，喝著現代化，才可能專門給現代化潑冷水，讓現代化頭腳冰涼，專門拿現代化打鏢。你越說進步了，他就說退步也不少；你說現代化是香饅饅，他就偏說現代化很醜陋。一個窮人，整天想著錢，他怎麼會批評錢呢？真正批評資本的是有錢或者曾經有錢的人。所以讀懂美國，要拆開來讀，縱讀之，歷覽美國來龍去脈的全部歷史；橫讀之，深入到美國人的內心。

現在所說的歷史觀、文明觀、基本文化立場的爭論，都是中國一百年來反復討論過的老問題。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大爭論，無論是批評傳統文化，如《河殤》，還是現在流行的弘揚傳統文化，如新儒家。表面上非此即彼，二律背反，非論出個好壞高低，實際上都是現代化病灶在中國的水土不服，上吐下瀉，忽兒自卑，望山跑死馬，忽兒自大，剛學了點三招兩式，過了幾天好日子，花拳繡腿就想把別人放倒。放言 30 年河東，30 年河西，21 世紀是中國世紀。其實二者在文化立場之間互為表裡，歡喜冤家。他們對歷史的觀察都有回溯性反差，倒霉看反面，全是以西方價值觀為參照系。一會兒說我古代比你闊，一會兒說我將來比你闊，全是現代化的強國夢。

李零講“傳統為什麼這樣紅？”用的是國際大眼光，大歷史觀。西方人，開口閉口，言必稱國際，你的我的，都是他的。國際二字，背後有霸道，但他們四海為家，氣魄比我們大。

全盤西化是個不爭的事實，但大家最愛爭，李零講全盤西化，不是價值判斷，而是事實判斷，不管好不好，愛不愛，這是大局已定的事情。你只要睜眼看一看，周圍的一切，幾乎全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哪怕是國產自造。

新儒家的迷夢，有一件事特自豪，中國歷史綿綿不絕，對外來入侵“柔遠能邇”、“遠人來服”、“歸義”、“歸化”。中國人的心態，我化別人，我愛聽；別人化我，絕不行。近代中國，明明已經被人化了，有人還在拿歷史說事：蒙元怎麼樣，滿清怎麼樣，那麼大的塊頭，不也叫咱們漢族給化了？

現在讀《蔣介石日記》，他的內心隱秘：第一，中國一定要抗日，第二“中日難免一戰”，但又沒有能力，所以要推遲決戰，等待國際大環境的變化。蔣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認為日本佔領上海之後，西方帝國主義就一定會出面干涉。蔣的算盤打錯了，當時的西方要的就是禍水東移。汪精衛少年時很英雄，刺殺滿清攝政王被捕，“飲刀成一快，何負少年頭”，“一死心期誅未了，此頭須向國門懸”，慷慨悲歌。對日本，他的想法是日本把中國滅了，沒關係，結果是，中國多了個日本族，第 56 個少數民族（這話，不僅中國人聽了生氣，日本人聽了也生氣）。想不到，這樣的話，汪精衛沒敢明說，而文懷沙今天卻敢如是說。古代中國是文化的制高點，現代西方是文化的制高點。現在的日本，現在的美國，你給化化看，別做夢了。想不到這種明擺著的事，照樣有人犯糊塗。

我們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現代化的西方，戰爭是第一生產力，戰爭不僅是國之大事，而且是球之大事，人家的現代化是打遍全球無敵手！然後才有全球的一體化。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挨打的歷史，中國人挨打，在人家赫赫武功面前強弱不敵，正因為老

大中華的文化，萬里長城又永不倒，失魂落魄之中才揀出一個國學來，李零稱之“國將不國之學。沒有西學哪來國學？與之相聯繫，全盤西化還來不及化，或化而不動，剩下來的東西就是國粹。”好東西，有用的東西，西方人早就拿走了，回敬你的洋槍洋炮，比你厲害。剩下的，喝完中藥留在砂鍋裡的國粹，其實很多是國渣。當然也有國寶，古跡、古物、古書。保古和西化如影隨形，西化的破壞，反面抬高了古董的身價。物質文化遺產，實實在在，非物質文化遺產虛虛假假，而且一大特點，假的比真的更好看。“物以稀為貴，只要是真的稀罕玩意兒，無所謂精華糟粕，它只是歷史的符號，我們把古董擺進博物館，但不必要把自個兒也擺進去。”

現在的國學，其實都是不中不西之學，不新不舊之學。西方有漢學家，同樣研究中國，他們和你比世界眼光誰大，比精通語言誰多，真讓國人氣短，毫無優勢可言。比如考古學、歷史比較語言學，那是地地道道的外國學問。當時的五大發現，東西是中國的，但全和洋人有染。陳寅恪、傅斯年、錢穆到國外幹什麼，全是憋著一口鳥氣，到國外學新學，偷新藝。大師就是海歸，用西學研究中國的玩意兒，推倒重來，白手起家，創建各門新學術的人。最突出的就是用考古學改造傳統的經史之學；用歷史比較語言學改造傳統的考據學。臺灣的史語所，史、語就是這樣來的。國家可憐，國粹更可憐，衣食住行全部西化。深衣、漢衣冠，早就沒有了。真國粹，有，農民穿的土布衫、免襠褲，誰穿？語言中只要與現代有關的多是外來語，很多是日本傳來的假漢語，最國粹的漢字，也被簡化了。

各地的公祭，燒香磕頭，高官引領，十分滑稽，萬分荒誕。陝西的黃帝陵，湖南的炎帝陵和舜廟，河南的二帝陵和太昊陵，山東的少昊陵，紹興的大禹陵都是假古跡。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各地拆了不少真古跡，造了不少假古跡，保護真的沒錢，造假的有的是錢。傳統為什麼這樣紅？共產黨的主流文化面臨信仰危機，

中西合璧取而代之。通俗化的，有溫度的，弘揚快樂主義的新儒家，還只是愚民，而官方提倡“以儒治國，以道治身，以佛治心。”這不僅是愚民，而是愚國愚官了。中國本無國教，何必總想再造？新儒學的右派，骨子裡是反共，而左派的儒教社會主義是拒斥西方化。為什麼就不能直面西方，直面中國，自其不變而觀之，自其常變而觀之。現在中國的許多毛病，有遠因，有近因，有內因也有外因。但中國的事搞不好，搞得好與中國的傳統沒什麼關係，歸根到底的責任是我們自己，不能總幻聽幻覺。現代化的問題，用現代化的方法解決，用不著找傳統，找什麼古玩秘籍。

現代中國，在弘揚傳統的旗號下，“金剎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破除迷信，宣傳無神論，都臉紅得不好意思。辦學校沒錢，建醫院沒錢，改革開放後修建了幾十萬座廟宇從不缺錢。各種假傳統、假古董，這些年到處在修、在造，傾圮無存的要復建，微縮移來的要放大。佛教的經義、戒律知之者甚少，舍難趨易最簡便的就是燒香磕頭。公祭之風吹遍華夏，祭孔、祭黃帝、祭炎帝、祭堯舜、祭關公、祭伏羲、祭女媧，連秦檜、西門慶、潘金蓮都有人祭。花樣還在不斷翻新，又傳出要花幾百億元在孔孟之鄉修聖城。中國的各門宗教信徒已幾億人，這頭一路磕過來，只讓國粹與國渣更加模糊。《麻衣神相》、《梅花易數》、《奇門遁甲》、《推背圖》都成了“預測科學”；算命、看相、風水、周公解夢、取陰補陽、縱慾求仙滿大街都是公開叫賣；還有那些“地獄奇觀、淫祀野祭”，也都是拿錢堆出。

以傳統救現代化之弊，外國科技好，中國道德高，高出些什麼？貪官豪奪，奸商巧取，各逞其能：毒大米，黑棉花，蘿蔔充參、硫磺熏筍，豬牛注水，白糖加沙，晝銷假藥，夜受賄賂，軍艦走私，弄權致富，工廠偷稅，暗竊國庫，濫捕珍禽，亂挖古墓，等而下之，都能暴富。中國思想的精華，絕不是“獨尊”之後的儒家，更不是宋明理學之後的儒家。令人誇張地鼓動“祭孔”

與“讀經”，反而排斥湮沒許多值得發掘的精華。一句《左傳》的“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到“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喊著叫著哭著鬧著要弘揚傳統的人，不妨試試。

現代化在全世界都是香餈餈。中國一百多年來，包括清末與民國初年，不僅僅不是閉關自守，拒斥現代化，反而是神農嚐百草一日七十毒，上吐下瀉，從洋槍洋炮洋務，衣食住行，洋布洋火洋瓷盆，洋胰子洋車子洋學堂，到北洋政府的辦議會，開黨禁，報紙滿天飛，六法全書，黨派林立。結果是國民經濟凋零破敗，戰禍兵燹此起彼伏，民族生存危在旦夕。現代化從一開始就是中國之福，從一開始就是中國之禍。慈禧老太太最後幾年，現代化的步伐不可謂不快，呼啦啦大清江山如僵屍出棺遇上空氣完得更快。⁹

回溯一百多年來中國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後繼，數以億計的人在外患內鬥中流血犧牲，都是現代化的必要成本。其目的是救亡圖存，其成果是中華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至今沒有亡國滅種。與美洲的印第安人、非洲黑奴比幸運，這要歸功於“五四”和“五四”相聯的中國共產黨。1840年的後一百年的上下求索，“五四”運動是分水嶺，“五四”運動光芒萬丈，彪炳史冊。

“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皇帝老兒，尤其是程朱陸王愚弄百姓的孔家店，孔子安然無恙。非聖疑古，表面是傳統中斷，其實是傳統重建。革舊鼎新，其意義不可估量，是西方科學發展觀對中國的全面佔領。自然、社會、人文、歷史、哲學、文學全面再造，最重要的是文化立場的突破，我們要感謝五四，感謝魯迅為代表的前輩。李零進一步分析：

胡適、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運動，反對尊孔衛道，懷疑孔子時代之前的聖人（堯、舜、禹），了不起的突破。雖然在方法論上仍有不足，但《古史辨》留下的問題，今天也還是問題，爭論

⁹ 李潔：《1912~1928 文武北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 年。

一直沒斷，今天還再大筆花錢搞什麼斷代工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真正的開山之作，舍上古聖人不談，直接諸子，直接老、孔。胡以老在孔前，馮友蘭以老在孔後，分歧仍在爭論。現在的主流認為，馮氏的書多書厚才是真泰斗。而李零的看法不一樣。胡適的考證誠多可商，但文化立場佔位卻比馮氏高。第一是胡強調中國哲學史不能用西方哲學史的概念和框架來剪裁，馮反之；第二是胡把孔子從聖人的位子上請下來，走下聖壇，和諸子平起平坐，而馮是尊孔派。胡適指出，馮氏爭孔、老先後是信仰問題，看得很準，今天也是解毒劑。李零分析很到位：

中國文化縮小為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縮小為宋明理學，宋明理學縮小為東方之道德，這是最沒出息的講法。東方之道德，真正獨具特色，是孝。但孝也是一種生存策略，不孝也是一種生存策略。匈奴貴少壯，賤老弱，不一定就不如我大漢的尊老和孝悌。謝肇淛、顧炎武都認為，夷狄的道德比中國高。今村昌平導演的《楮山節考》就是講另一種生存策略。西方的老不養小（16歲以後不管），小不養老，也是一種生存策略。動物界裡就是如此，兩種生死相繼的哲學都有。我們和西方，頂多彼此彼此。現在，我敢說，中國的社會公德絕對不如西方。西方科技好，我們道德高，我很奇怪，這種混蛋話，怎麼現在還有人講。

我們的傳統是無法無天。

缺點是不守規矩，好處是不受束縛，西方道德特點是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孔子強調的“三畏”，其實是西方精神，我們反而缺乏。

把儒學變成道德，變成宗教，或者道德宗教，不是老一套，而是新一套。

復古只是表面。

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缺乏宗教感，沒什麼不好。新史學的各派，成敗是非仍可存論，讚美臺灣，否定大陸，此疆

彼界，把傅斯年、錢穆抬得那麼高就是意識形態。新材料的發現，全在大陸，研究是由大陸學者在繼續，超越過去，打散提高再認識，過去根本沒法比。比如社會史的研究，也和共產黨有關，走過不少彎路，也有很多貢獻。新史學的各派，成敗是非可再論，它們的共同來源都是“五四”。厚誣“五四”，是數典忘祖。現在罵郭沫若，抬錢穆，郭的學問，錢不可比，他們的不滿說白了是對郭的政治立場不滿。

亞細亞生產方式說，是西方 19 世紀歷史學偏見的組成部分，它的核心是承認西方代表著先進文化，是文明發展的方向，這是最根本，最要害的。馬克思主義的進化模式，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其實在原來的三大文明圈中，西歐處於比較落後的邊緣。西方資本主義產生與發展，是三大文明聚合融化裂變，如同基因變異的新種。這種變異，戰爭是西方發展的第一生產力，瞭解西方資本主義，不去瞭解它的赫赫武功，不去瞭解西方是如何將戰爭從國之大事，洲之大事變成球之大事，根本就不可能解構西方從落後的邊緣，一躍雄起，生產力獨步天下的真諦。“資產階級爭得自己的階級統治地位還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產力卻比世世代代總共造成的生產力還要大，還要多……仿佛用法術從地底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試問在過去哪一世紀能夠料想到竟有這樣大的生產力潛伏在社會勞動裡面呢？”¹⁰

李零的看法很簡單，“對亞細亞或東方，即歐洲以外的歷史應該做獨立研究，這種研究僅以現已獲得的知識而言已大大突破馬克思時代的認識。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說，雖然包含了他對人類早期發展的許多猜測，但這種猜測，如果借用《莊子》的一句話來說，在當時還是一個‘混沌’。現在混沌已被鑿破，它也就不再具有理論指導的意義了。”

¹⁰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第 471 頁。

中國傳統社會的研究很重要，但從根子上講要改變觀察問題的角度，直白地說，就是要改變包括馬克思在內的上世紀歷史學家的那種觀察角度，要從頭對中國歷史做深入細緻的獨創性研究。

中國歷史在世界史上很重要，現代考古學家把世界文明分為三大塊，一塊是舊大陸西端以地中海沿海岸（西亞、北非和南歐）為中心的文明圈，一塊是舊大陸東端以中國（或者還有東南亞）為中心的文明圈（印度介乎二者之間），一塊是以中南美洲為中心的文明圈。中國文明不僅是東亞文明圈中最富代表性的文明，起源早，發展程度高，傳播範圍廣，而且還保持了一種綿綿不絕的文化線索，它在傳統農業社會的發展中所達到的成就是無可比擬的。¹¹ 這樣的提法絲毫不想掩飾中國近代的落後，而是指明西方歷史學家惟獨對中國，他們知之甚少，相當隔膜。

馬克思把希臘看作惟一“正常的兒童”，其他文明不是“早熟”的兒童就是粗野的兒童。這是受到當時歷史材料的局限，是繼承了黑格爾的成說。現在的考古學早就超越當時的眼界，變換一下觀察的角度，中國在農耕文明中是最正常的，換一角度，不僅更加順理成章，對於解釋中國歷史也較少鑿枘不合之處。

以生產力為核心的歷史唯物主義階段論用以解釋西方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但用它來生硬解釋其他文明卻是方柄圓鑿，處處不順。用這一方法研究中國歷史，近百年來就形成分期、停滯與萌芽三大問題纏鬥不清。不同派別的共同問題都是拿歐洲歷史作尺規，這是致命的硬傷。這個尺規本身是有問題的。“奴隸”和“農奴”即使在歐洲也不是唯一勞動形態。¹²

¹¹ 李零：〈中國史學現狀的反省〉，《李零自選集》第8~9頁。

¹² 馬克舜：《北京大學學報》1978年，第2期；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梅洛蒂：《馬克思和第三世界是極端馬克舜的批評有道理》；馬克堯：〈農奴與農民〉，《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第五章，人民出版社1985年。

五、東方、西方，三大異同

西方歷史學家湯因比考察了歷史上 21 種文明的發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最後得出結論，認為只有中華文明可以最終地拯救世界，如果中華文明不能承擔此任，這個世界將很悲慘。湯因比是在西方的文化氣氛中成長起來的歷史學家，他對西方的物慾橫流、商品拜物教、資本對人性對環境的異化深惡痛絕，對西方的病態充滿了失望。他的話中國人愛聽，“風水輪流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也迎合了一些中國人所說的 21 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但是未必，我們對中國是什麼、中國要什麼、中國舍什麼？要有一顆平常心。

在世紀之交，品味歷史，咀嚼文字，從有我之境，到無我之境，既拋開歐洲中心論，又拋開中華老大論，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尋找被觀察者的主述。

湯因比的觀察，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在世界三大文明圈中，只有中華文明具有綿綿不絕的文化線索，而其他文明充滿了斷裂。現在的希臘不是古代的希臘，現在的羅馬不是古代的羅馬，現在的埃及不是古代的埃及，現在的伊拉克不是古代的亞述，現在的印度不是古代的印度，中華文明為什麼有這樣長久的生命力？

中國和西方的差異大，正如歷史學家李零先生所指出：

不是一時半會兒大，而是從始至終大，但兩者仍有可比之處。他們的不同，有些是配方的不同，藥味其實差不多；或者像翻毛大衣裡外穿，大衣有兩個面還是一樣的。比如，歐洲和我們，兩者都有自己的宗教傳統和國家形態，都有整合政教，變血緣組織為地緣組織，把後者做大的過程；爲了消弭種族、文化和宗教的衝突，爲了超越小社群的狹隘和局限，雙方都有“大統一”的衝動，由豪酋而王，由王而帝，但兩者的取徑大不同。我們中國從

前也是小國寡民，也是封建諸侯，但兩千多年前就有法典化的統一民族國家、發達的文官政治、郡縣制度、科舉考核制度、涉及廣泛推行普遍的標準化，這和歐洲歷史的對比很強烈。

而 18 世紀，歐洲才開始做和準備做類似中國的事情。如政教分離，建立文官政治等等。啓蒙思想家對中國一見鍾情。他們把中國當作自己的“未來”，至於現在的經濟學家，認為當時中國的 GDP 佔到了世界的 30% 以上，也是一種猜測。可見歐洲受惠於中國，不僅是“四大發明”，也包括制度創新。直到 19 世紀以來，全球資本主義擴張，搭上了時代的快車，歐洲才“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才不把中國放在眼裡。歐洲由“王道”近於“帝道”，一直步伐艱難，他們雖然也有希臘化時代，也有疆域不小的羅馬帝國，也有禦守北邊的哈德良長城，但他們的帝國都曇花一現，充滿了斷裂。而我們的帝國從秦到清，兩千多年“萬里長城永不倒”。他們的“帝國主義”發達起來是我們衰落之後。即使今天，歐洲還是小國林立，國王一大堆，車不同軌，英國車左行，大陸的車右行；書不同文，一國一個樣；米尺和英尺打架，公斤和英磅衝突，沒有統一的度量衡。歐洲統一的工作，從歐元的啓動才剛剛開始。

至於貌似年輕的美國，之所以強大，實際上是在一塊新大陸上，沒有歷史的包袱，表現了東西方文化融合的雜交優勢，就像他的人種所表現出的雜種國家一樣。人家沒有宗教、王權、資源、人口壓力，在幾乎殺盡印第安人後，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中國和歐洲比較有三個方面的不同。首先是政教方面的不同，中國的“大一統”首先是國家“大一統”，其次是文化“大一統”，全是世俗意義上的“大一統”。宗教“大一統”，漢武帝試過，很不成功，所以宗教一直擺在國家的下面，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如同今日的美國。這和歐洲很不一樣，但從國家的觀點看，卻是好處多多，不但各種宗教可以和平相處（我們的傳統是三教合流），而且各人選擇的餘地很大，一個人可以信幾種宗教，而且知

識分子所組成的官員，還可以不信宗教，只信孔孟（“敬鬼神而遠之”，“子不語，怪力亂神”）。不像西方信仰不同，劍拔弩張；宗教不同，彼此相愛婚都結不成。西方沒有我們這樣的“大一統”，他們只有宗教“大一統”，他們的宗教是整個地中海地區的大宗教。包括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是普世性宗教，超國家的大宗教。三教同緣，卻打得最兇，對內缺乏寬容，對外強加於人，不但有宗教裁判，而且有宗教戰爭，至今依然是國際爭端的老大難問題，這和中國很不一樣，中國善於取經，西方喜歡傳教。

中國和歐洲另一個不同，即中國很早就擺脫了貴族傳統。歐洲小國林立，國王一大堆，很類似中國的早期格局。中國春秋和春秋以前，也是貴族的天下；國君是貴族，卿大夫是貴族，士也是貴族子弟，“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披堅執銳的武士，從將帥到士兵都是貴族。但在中國很早就發生了禮崩樂壞的變化，“天官”（管宗教和禮儀的）不如“地官”（管行政和軍事），“武官”不如“文官”。四民之序“士農工商”，其中沒有僧侶。後來發展到平民可以當兵，憑軍功取爵。戰國以來，中國不但有平民的卿相，後來連皇帝都可以出身草莽。“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大丈夫應該如此，彼可取而代之”，“皇帝輪流當，今日到我家”，這和歐式的貴族傳統不一樣。

中國和歐洲的第三個不同，既表現為中國人的造反或曰農民戰爭的傳統，也和歐洲不一樣，極有特色。我們中國的“造反”，一是“合理性”強，在道統、法統兩方面都有餘地；二是“週期性”強，兩三百年必有一回，這種平民傳統與歐洲很不一樣。歐洲的老百姓一畏鬼神，二怕貴族，沒有文化，沒有組織，不像我們的“造反”，官、紳、士三位一體，上有領導，下有群眾，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從宋江、林沖到武松、李逵一應俱全。政權的代替系統早就裝在社會的硬盤上，隨時可以啟動。它不僅有破壞性和反體制因素，而且也是社會再造和改朝換代的工具。

這三大不同，上下幾千年，縱橫數萬里，保證了中國的文化綿綿不絕，不管是蒙古人創建的元代大帝國，還是滿洲人入關的清代大帝國，都保證了中華文化萬世一系的相傳，儒、道、佛融會，表現了中華文化的包容性。中西比較，最難處理的是時空錯位，以時間排序。實際上中國有專制可反，很早就沒有封建可反。

現代離古代並不遠，基本人性是一樣的，古代與現代人類的基本興奮點也沒有什麼根本的變化。對比中國和西方，我們不難發現，兩者都有“螳螂撲蟬，黃雀在後”的過程。在西方，西亞、北非是“蟬”，希臘、羅馬是“螳螂”，日爾曼是“黃雀”。我們的文明，中原是“蟬”，農民起義是“螳螂”，西北，東北的蠻夷是“黃雀”。司馬遷說，“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其功實者長於西北”。西北征服東南，東南腐化西北，“文明”遭到“野蠻化”的征服是相同的。但中國和歐洲比，我們對“野蠻化”的抵抗和吸納比他們成功，他們的“野蠻化”是文明臻於腐敗後的大換血，原來的文明被摧毀、打斷、遺忘，變成“失落的文明”。而我們對付“野蠻化”，不管是元，還是清，療程長而藥效緩，後來的文明與原來的文明不但前後相連，而且中華文明永不倒，化腐朽為神奇。

現代化的高貴出身和現代化對東西方都是香餈餈的迷信受到了懷疑。當今世界一百年的回顧與展望，強者恒強，弱者恒弱，表現為一種先搶和後搶的關係。歐美帝國是先搶者，德日帝國是後搶者，後搶者的心態很不平衡。社會主義運動是世界被拖入資本主義總體系中的必然反應。疾風暴雨的社會主義運動，在西方隨著 1871 年巴黎公社的失敗，已宣告結束。在東方隨著蘇聯的解體，也陷入低潮。東方的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總體系下，為了適應全球資本主義化的一種後發形態，通過剝奪自己完成積累。馬克思主義是隨西方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而引起的 19 世紀理性思維中的一種批判學說和獨特的話語體系，它沒有解決資本主義全

球化帶來的問題，但是它曾幫助資本主義克服自身的缺點，調整自身的結構。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設想被實踐徹底改變，他認為，將成為社會主義先驅的發達國家更加帝國主義化，而在他社會主義設想視野之外的東方落後國家，卻不無諷刺地進入社會主義實踐。這是石破天驚的驚險一躍，不可不察。後來，社會主義實踐的一切變化、一切始料未及的災難，都在這變化中潛伏下來。

冷戰結束之後，歐美所宣傳的全球化，實際上還是西方的全球化，特別是美國的全球化，他們所宣傳的“新秩序”，完全是二戰之前的那個舊秩序。世界強國的七加一會議，還是當年的八國聯軍。

中國作為一個後發型國家，在這樣一種國際大環境下，我們所說的“平常心”，就是要丟開窮漢發財的幻想，丟棄重做老大的強國夢，丟棄在古與今、中與外之間總是擺不平，不斷地“開方”、“支招”、“玩命開發”的“競賽意識”，丟棄心態失衡之中的幻聽幻覺。一百年來，中國人為了自己的發展，不僅是閉關鎖國，而且對於西風東漸，簡直是上吐下瀉，東試西試，隨機耦合，什麼方法都用盡了。“五四”運動，表面是傳統中斷，其實是傳統重建。西學全面佔領，新學全面重建，文化立場根本性突破。有巴黎和會，袁世凱與日本人簽定喪權辱國的 21 條背景，馬列左翼開風氣之先，豈容翻案。